



敦煌文化丛书
DUNHUANG WENHUA CONGSHU

敦煌历史文化

● 刘进宝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敦煌文化丛书

敦煌历史文化

刘进宝
编著

DUNHUANG WENHUA CONGSHU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历史文化 / 刘进宝编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6

(敦煌文化丛书)

ISBN 7-226-02247-8

I. 敦… II. 刘… III. 敦煌学-研究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8411 号

责任编辑: 曹 韧

封面设计: 陈绍泉

敦煌文化丛书

敦煌历史文化

刘进宝 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31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6-02247-8/K·369 定价: 11.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 言

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 100 周年。100 年前的 1900 年 6 月 22 日，一个偶然的机遇，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科。这门学科虽然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其研究对象，但它是敦煌地域文化的产物。因此，如果要全面了解、研究敦煌学，首先应熟悉敦煌学的基础与背景——敦煌的历史文化。

敦煌学的各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敦煌石窟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 年）开始修凿，一直延续到元代。敦煌遗书则是指藏经洞所出 5 世纪至 11 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的敦煌史



地，与地方史的研究又不完全相同，它应有自己的侧重点，即以汉唐王朝为主；并反映其历史文化特点，即回鹘、西夏等少数民族对敦煌的占据。因此，我们对敦煌历史文化的介绍，也尽量反映其时代特点和文化内涵，对于汉以前和元以后，仅仅是简略提及。



目 录

- 一、敦煌的上古历史与居民 (1)
- 二、“敦煌”释义 (6)
 - 1. 汉族名称 (8)
 - 2. 少数民族语 (9)
 - 3. 与希腊人有关 (13)
- 三、汉代敦煌的大发展 (16)
 - 1. 汉代对敦煌的开拓 (16)
 - 2. 设置郡县行政区 (19)
 - 3. 建立军事防御体系 (23)
 - 4. 移民实边与河西屯田 (30)
- 四、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37)
 - 1. 学术文化的发展 (38)
 - 2. 佛教活动的兴盛 (46)
 - 3. 佛教艺术之花的绽开 (51)
- 五、隋唐时期敦煌的辉煌 (54)



1. 隋炀帝对河西的经营与张掖互市	(55)
2. 唐前期对敦煌的统治	(60)
3. 经济的高度发展	(66)
4. 中西交通的兴盛	(70)
5. 辉煌灿烂的莫高窟艺术	(75)
六、吐蕃统治下的敦煌	(79)
1. 吐蕃对敦煌的占领及其民族统治	(80)
2. 吐蕃时期的部落——将制	(91)
3. 吐蕃时期的经济制度	(95)
4. 渐趋衰退的敦煌艺术	(100)
七、孤悬西陲的归义军	(103)
1. 张议潮起义及归义军政权的建立	(103)
2. 归义军政权的沿革	(111)
3. 归义军时期的统治政策	(122)
4. “日落西山”的敦煌艺术	(135)
八、沙州回鹘政权	(140)
1. 归义军时期的回鹘	(141)
2. 沙州回鹘政权	(143)
3. 沙州回鹘时期的莫高窟艺术	(147)
九、西夏对敦煌的统治	(150)
1. 西夏对瓜沙的统治	(152)
2. 西夏时期的敦煌艺术	(153)
十、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敦煌的沉寂	(158)
1. 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	(158)
2. 渐趋沉寂的敦煌	(162)
3. 敦煌艺术的尾声	(164)
后记	(168)



一、敦煌的上古历史与居民

提到敦煌历史，人们就会想起《尚书》记载的舜“窜三苗与三危”的“三危”。认为《尚书》中的“三危”就是今天敦煌县境的三危山，并由此说明，早在尧、舜、禹时代，敦煌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了联系，并接纳了一大批三苗族成员。

实际上，《尚书》中的“三危”并没有在敦煌，从目前已有文献和考古资料看来，在汉代时，“三危”都还没有和敦煌发生关系。

那为什么人们都将“三危”与敦煌相连呢？从现有资料可知，最早将三危与敦煌联系起来的是杜预，他在《左传》昭公九年注中说：“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实际上《左传》的原文是：“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而瓜州又在西裔，因此



杜预一方面将三苗与允姓之奸等同，另一方面又将瓜州与三危等同。再加上瓜州即敦煌，故三危也在敦煌。自杜预这样解释以后，“三危”就算和敦煌结缘了。遂后，许多人都附会了这一说，如《水经注》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括地志》说：“（三危）山在沙州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实际上，目前还无法确定“三危”具体的地望。何况传说中尧、舜、禹的活动地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其影响所及根本不会达到敦煌一带，所以也不可能把古敦煌作为流放罪人的地区。

既然如此，作为注释《左传》的学者杜预，为何又将三危与敦煌相联系呢？这就又涉及到了瓜州的问题。早在东汉初年，瓜州就被认定在敦煌。这是因为王莽末年杜林曾避乱于凉州，知敦煌出“美瓜”，遂以为敦煌即古瓜州。班固在著《汉书》时，在《地理志》敦煌郡敦煌县下注曰：“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由于史学家班固记录了杜林的看法，此后人们遂将敦煌定为《左传》中的姜戎、允姓之奸所居之瓜州。

实际上，这种说法漏洞颇多，阚駟在《十三州志》中首先提出怀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顾颉刚先生在1937年著文辨正，解放后又重申旧说，认为“瓜州”不在敦煌，而在关中秦岭一带。他认为瓜州之戎即《左传》中的“九州之戎”，古音瓜、九同在见纽，音同故通假；姜戎自称为“四岳之裔胄”，顾先生考证出最早之四岳，“为西方萃聚之四山”，是姜族兴起之地，则四岳所在即瓜州所在；最后结论说：“窃意瓜州当在今凤翔之东，实居秦晋之间，故秦人得而迫之，晋人得而诱之。”“故予敢断说，瓜州必不在敦煌。”^①刘光华先生也通过考证得出了

① 见顾颉刚《九州之戎与禹戎》，载《禹贡》第7卷6、7合期；《史林杂识（初编）》。



结论，《尚书》中的“三危”不在敦煌，《左传》中的“瓜州”不是敦煌。^①

我们所说的敦煌地区上古居民，是指汉王朝控制河西以前活动于敦煌地区的民族。

河西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交汇之处，民族角逐频繁，其居民也常常处于流徙移动的状态。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地区，其上古居民就具有了这种移徙流动的特点。

关于敦煌的上古居民，据文献记载，主要有三苗、允姓之奸（瓜州之戎）、乌孙、月氏和匈奴等。前已辨明，三危不在敦煌，瓜州也不是敦煌，因此三苗、允姓之奸等就应被排除在敦煌居民之外。

从总体上说，我国古文献对古代西部地区的居民有一种传统的称谓，即氐羌、羌戎和西戎。如《诗·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郑笺云：“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孔疏曰：“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说文解字》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从这些记载可以得知，地处我国西部地区的敦煌，其上古土著居民属于氐羌（或羌戎、西戎）这个大“类”。

197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今疏勒河流域的玉门市火烧沟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火烧沟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除常见的陶器、石器、铜器、金银器外，还有马、牛、羊、猪的骨骼，尤其是“羊骨多而普遍”，“随葬的成对的羊角，分为大羊、中羊、小羊”。火烧沟类型文化的这



^① 见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第3期。

一特征，与文献中记载的羌“主牧羊”、“西戎牧羊人”是一致的。而火烧沟类型文化的时代，据 C14 测定，其年代“最晚为公元前一六〇〇多年”，“大致与夏代相当”。从所获遗物来看，火烧沟人的社会生活并不比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落后，而且还与外界有了交换关系。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火烧沟墓葬贫富和等级差别，非常明显”。因此火烧沟人，和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即“已进入了早期的奴隶社会”。^①

火烧沟类型文化的分布，除玉门、敦煌平原外，向东已达到了民乐、山丹一带，但没有越过大黄山。从考古学人类划分来看，在夏代及其以前，大黄山以西（包括敦煌地区）的居民是火烧沟人，而大黄山以东的武威、永昌平原则是齐家人。因此可以说，火烧沟人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敦煌地区最早的上古居民。

战国至秦，文献中所见敦煌地区的居民有月氏和乌孙。如《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曰：“昆莫父难兜靡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汉书·西域传》也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史记》、《汉书》的这些记载虽然清楚地说明月氏、乌孙是敦煌的居民，但还是比较笼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月氏故地在甘州附近，而乌孙的活动地域在月氏以西，即今酒泉以西的敦煌地区。

作为敦煌地区的主人乌孙，原来就是敦煌地区的土著居民，还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由于古文献资料的缺乏，目前已无法回答了。从现有资料可知，秦朝末年，乌孙受到了邻近强大的月氏族的攻击，其王难兜靡战死，其子逃到匈奴，被冒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 1980 年《甘肃省历史学会论文集》，甘肃省历史学会 1980 年内部印行。

顿单于收养，其地亦被月氏人占据。

秦朝时期，月氏是敦煌乃至整个北方的强大民族。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当是之世，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乃使（太子）冒顿质于月氏。”秦二世皇帝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冒顿即立为匈奴单于后，便开始了雪耻的准备。随后就发动了一系列扩张战争。其中在汉王刘邦四年（公元前203年）以前的一次战役中，“西击走月氏”，即在匈奴的打击下，月氏向西逃亡了。

匈奴击走月氏后，便控制了整个河西。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地”。直到汉武帝时派霍去病攻打匈奴，占据河西走廊为止，匈奴在敦煌地区的活动约100年。





二、“敦煌”释义

敦煌这个名字，是汉武帝建郡时命名的。根据古籍记载，此地古属雍州。《尚书·禹贡》篇在论述九州中的雍州时，就明确指出其西界为黑水：“黑水西河惟雍州。”《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古雍州条》解释说：“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翼州西故曰西河；黑水出今张掖郡鸡山，南流至今敦煌，经三危山，过今南溪郡而入南海。”又说：“汉之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其分地。”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也曾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尚书·舜典》说，在虞舜时，帝舜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许多人认为“三危”

就是指今敦煌南面的三危山。《左传》襄公十四年，晋范宣子数姜戎氏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又昭公九年，周詹桓伯辞于晋，也曾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这都是晋惠公由秦东归，迁戎于伊雒流域近于周王都城雒邑所引起的问题。允姓为阴戎之祖，也就是后来的姜戎氏。杜预解释说：“瓜州在今敦煌。”实际上，在杜预之前，杜林就已经这样认为了。《汉书·地理志》敦煌县的注文说：“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唐代颜师古更作补充说：“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其实，瓜州之戎并非就在敦煌，这一点顾颉刚先生曾提出五大理由予以驳斥。但由于杜林的说法几成定论，后魏明帝时竟于敦煌设立瓜州，经过一度改名，瓜州还是成为定称。

《禹贡》于黑水、三危之外，还提到弱水、猪野、合黎和流沙。《禹贡》述道水，是先说弱水而后才提到黑水。由此可知弱水也是一条大川，后来人们认为今张掖河相当于弱水。如果这一认识不误，合黎山和流沙也就容易解释了。今合黎山在张掖西北，张掖河绕合黎山之西而北流，正和《禹贡》所说相符合。张掖河下入居延海，其周围皆为沙漠，也恰好可以解释所谓的流沙。因此，《禹贡》的作者对于雍州的西部，也就是后来的河西，虽然不能像对当时其他诸州那样的了若指掌，基本上还是相当明了的。因为这里当时可能还是从事游牧的族类所居，和内地诸侯称雄的局面不同。^①

《史记·五帝本纪》引《括地志》曰：“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水经

^① 参阅史念海《河西与敦煌（上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



注》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在《元和郡县图志》卷40中，唐代李吉甫这样认为：“三危山在（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甯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清人常钧在其《敦煌杂钞》卷下《三危山》中说：“尚书孔安国传，三危西裔之山，舜甯三苗于三危，禹贡三危既宅是也。隋志敦煌县有三危山，括地志山在沙州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都司志三危为敦煌望山，俗名升雨山，在今城东南三十里，三峰耸峙，如危欲坠，故名。”

敦煌的含义为何？它得名于什么？历来存在分歧，至今仍然未有定论。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 汉族名称

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

李正宇先生根据《史记》、《汉书》等关于河西及敦煌的记载，认为“在敦煌建郡之前十余年已有敦煌之名，知敦煌一名原所固有。十余年后建郡，乃因原名而名郡。‘敦煌’一名尚属汉人取自土著民族，而当地古代民族更何由用汉语名其山曰‘三危’，名其地曰瓜州？”^①

据李先生研究，应该是汉朝占领敦煌后，见敦煌东南之山，顶有三峰，次第排列，遂将《舜典》、《禹贡》中的“三危”一名移置此山。自汉武帝建郡直到西汉末，长达130多

^① 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32页~33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



年，对此名呼之既久，乃习以为常，便以为敦煌“三危”即古之“三危”。除此之外，还有心理因素的作用。第一，出于当地人自矜乡土之情。人皆欲所生乡土为自古名区，求之古典，《舜典》、《禹贡》恰有“三危”，《左传》又有“瓜州”，于是就附会渲染，形成舆论，久之，便弄假成真了。第二，出于政治之需要。敦煌建郡之后，大批移民陆续迁来，而当地固有之匈奴、乌孙及羌人遗民及其文化传统受到排挤，民族矛盾继之而起。而被汉人赶走之匈奴、羌人政权也常想赶走汉人，夺回故地。汉人则欺匈奴及羌戎无古典可稽，而自举出《尚书》、《左传》之“三危”、“瓜州”，以证敦煌早就属尧舜旧城，三苗顽器，不过谪居于此，地本属我，今物归原主，名正言顺；杜林之父杜邟，成帝哀帝间为凉州刺史，青年杜林随父尝居凉州，中年遭王莽之乱时，复与弟杜成再来凉州避难，熟知当地关于“三危”之新说。东汉初杜林返回长安，授徒讲学，便用在凉州的见闻来阐释三危瓜州。班固注《汉书》时虽引其说，而云“杜林以为”，可知班固将其仅视作一家解经之言，不作定论也。



2. 少数民族语

对于敦煌的汉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日人藤田丰八在其《西域篇》考订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 Tokhara 的译音，而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的音译。

刘光华先生认为，“敦煌”一名在汉武帝设置河西郡县以前很早就出现了。《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敦煌”和后来的敦煌县、敦煌郡无关，因为它反映的史实发生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而和“祁连”连用的“敦煌”，肯定不是指敦煌县、敦煌郡，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这个汉音写名的发明权或者就是属于张骞的。至于

“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就无法知道了，所以应劭从汉语之字面意义上给予解释。

刘先生说，“敦煌”这一土名，虽然后来为汉朝郡县所沿用，但其所指地区的范围可能比日后的敦煌郡为大。河西走廊可分为三个自然区域，每个自然区域又与一个较大的内流河流域相对应。今山丹境内的大黄山以东为武威、永昌平原，属石羊河流域；大黄山以西至今嘉峪关西的黑山为酒泉、张掖平原，属黑河流域；黑山以西至今敦煌县西境为玉门、敦煌平原，属疏勒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应是古敦煌的范围。其土著居民沿河而牧，往返活动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上，故范围较大。而后来所建立的敦煌郡则为一政治区划，其范围指今玉门、敦煌平原之西部，即安西、敦煌两县境疏勒河以南地区，这是汉朝统治者从军事、政治需要出发而规划的行政建制，与该地区上古居民依自然山川河流劳动、生息，并作为其活动范围有所不同，前者较小，后者因任自然形势，故比较大。^①



施萍亭先生也认为，对于敦煌的解释，“少数民族语的可能性要大些”^②。

王宗维先生认为，“敦煌”是族名，它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即吐火罗的简译。在《“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③一文中认为，《山海经·北山经》、《水经注笺》卷2所记载的敦煌，其范围约当今巴龙台以南，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直

① 参阅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第3集。

② 施萍亭《敦煌随笔之一·“敦煌”二解》，载《敦煌研究》第3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